

陈继龙 著

韓偓事迹考略

周退密人
周退密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陈继龙 著

韓偓事迹考略

九十老人
周退密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偓事迹考略 / 陈继龙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6
ISBN 7—5325—3719—6

I. 韩... II. 陈... III. 韩偓(约842~923) - 生平事迹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5614 号

韩偓事迹考略

陈继龙 著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6.875 插页4 字数160,000

2004年6月第1版 2004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25—3719—6

I·1705 定价:20.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T:64063949

前 言

《韩偓事迹考略》的撰作，并非率意而为。它最初起因于我本人追求完美的心理。2001年，《韩偓诗注》行世，尽管自以为“以意逆志”，深得韩诗原旨，但之后，仍发现若干问题：首先，在诗人个别诗作的系年上，有欠妥当，由此带来在一些具体作品的诠释上不尽合理，至少有强作解人的嫌疑；其次，在确定诗人转徙南北各地的行踪上，发生少量错误，致使注释作品时不免于隔靴搔痒，有的甚或张冠李戴；最后，遗漏了某些事后才收集到的材料，而这对于深入了解诗人的生活经历、思想面貌与理解其部分作品，有不可轻视的作用。凡此种种，均需或补偏救弊，以正视听，或丰富充实，使臻完备。

然而，与这同样重要的写作动力是，囿于当时注释诗集的体例，令我不能酣畅淋漓地抒发对于韩偓其人其事的见解（仅在《韩偓诗注·前言》里有所论述），至于关涉诗人的历史事件，更只能点到为止，不能挥洒自如地加以评论。这于我，一直是引为莫大憾事的。显然，只有采用论著的形式，方能满足上述要求。

这样，《韩偓事迹考略》的撰写，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知人论世，要深知其人，必定要论及其所处的时代。《韩偓事迹考略》，对晚唐五代的社会历史背景，作了力所能及的评述，尤其是将韩偓放在当时各种社会活动的具体环境里，进行多视角、全方位的考察，力图勾画出作为诗人兼政治家（尽管是不成

功的)以及隐逸者的韩偓的肖像。或许,这帧肖像有几分失真,但至少可以使今人约略窥视到韩偓的真实面貌——他的行藏出处,他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乃至他的隐秘的心灵世界。只有愈加真切地把握韩偓其人其事,以及他所处的时代,才能愈加透彻地了解他创作诗歌的本意。韩诗固然不乏无病呻吟之作,然通观其传世的作品,应该说,绝大多数还是有感而发,与世事丝丝入扣、息息相关的。同样,通过研读韩诗,我们也能较为感性认识那个时代的历史。

现在的人们,一提到唐,往往将其与繁盛、强大、富庶联系在一起。殊不知,到了唐代末年,李唐王朝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那是一个海枯鱼烂的时代。藩镇骄横跋扈、如狼似虎;阉竖专擅朝政、胡作非为;皇帝成了任人摆布的玩偶。在面临沧桑陵谷巨变之际,朝廷官僚都会被迫作出自己的抉择:或依宦官,或从军阀,或矢忠于唐室。如果说,韩偓在朱全忠尚未篡弑之前的“捋虎须”还只是逞一时之勇的话^①,那么,他在梁取代唐后所作出的二项选择,则反映了他对于当时重大政治事件的基本态度。

韩偓的选择之一是,始终拒不承认后梁王朝的正统性、合法性,始终流露出对于李唐王朝,特别是昭宗的忠愍之情。语云:“识时务者为俊杰。”而韩偓的这一举措,显然是所谓“不识时务者”,后人可能还会把它视作是“愚忠”。鄙意以为:是否“愚忠”,撇开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不论,以历史主义的观点来衡量,关键是看后梁较之唐王朝的进步性到底如何。历史事实表明,后梁是一个腐朽、残暴因而也是短命的王朝,朱全忠更非明君。韩偓屡屡拒绝其征召,不与之同流合污,实属明智之举。

韩偓的选择之二是,看清李唐王朝发展至末季已颓运难挽,故宁可远走高飞,以一个隐遁者的身分,置身事外。有人说他乃

全身远祸，这大体是不错的。与其说韩偓是嵇绍式的人物^②，倒毋宁说是陶渊明式的人物^③。尽管忠愤之词时时溢于言表，但在实际行动上，韩偓并没有做出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来。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势单力薄、孤掌难鸣，也没有像战国苏秦那样的才略，能以自己的广长舌，鼓动天下诸侯，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朱梁王朝，而另一方面，则更是他晚年已趋淡泊的性格使然。他选择了徜徉于闽、赣的青山绿水之间，与渔樵为伍，同缙羽论道，自得其乐，超然物外。韩偓是智者，他知其不可为就不为了，在无可奈何之下，只能以做一个桃花源中人而聊以自慰。设如当时韩偓与朱全忠作金刚怒目式的抗争，这又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了。

《韩偓事迹考略》一书重在考证韩偓本事，兼及其他。全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分别考证韩偓的生年、字号、出生地与家世；中篇勾稽韩偓科举应试与为官时期的故实；下篇探索韩偓贬谪后至客死福建间的踪迹。

本书采摭材料颇多，举凡史乘笔记、诗文评述、年谱地志与韩偓有关涉者，力求旁搜远讨，钩沉索隐，穷源竟委，靡使阙失。

本书严核所取材料，努力去芜存菁，去伪存真。凡前人荒唐悠谬之言，皆削而不存，或详加订正。要之，本书一秉实事求是的精神，以严肃认真的态度，研韩说韩，使之别开生面。

本书于韩偓事迹滞疑处，解缚去粘，窃以为创获良多。如黄巢陷长安后，韩偓的去向，从来的研究者多讳莫如深，或语焉不详。本书提出大胆设想，并以内外证据，条分缕析，证成其说。再如韩偓贬官出京后第一年的行踪，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书借助多种资料，厘清纠葛，勾勒线索，尚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又如当日与韩偓有关的众多人物，本书更是着力考索辨证，一一坐实，似填补了古今论韩的空白。而于光化末年至天复初

年，韩偓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其忠君辟奸的事迹，本书亦广事搜辑，详加评述，勾画了他作为政治家一面的肖像。这是以前的研究者所忽略的。

《韩偓事迹考略》一书的写作，历时二年有余。其间，虽时作时辍，然无论家室的迁居，身恙的妨碍，还是事务的繁剧，均不能动摇我底于葺事的决心。该书自前年属草，迄于今秋终至杀青，差堪慰藉我付予此书的心血与时光。

在上述二年里，我一直围绕韩偓一生，在做点点滴滴的考证，偶有所获，辄喜出望外。琐屑固然琐屑，但历史的面貌却由此渐渐凸现出来了，由模糊而至于清晰，由黯淡而趋于明朗。历史犹如一副骨骼，历史中的人与事则构成它的血肉。通过对历史中的人与事的实证研究，历史就鲜活丰满起来。这，大概就是我近几年来在韩偓事迹考证里讨生活的最大收获吧。至于借此透彻了解韩偓的诗歌，抑或受其名节上的感染，倒是还在其次的。

胡适之先生提出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治学的不二法门。没有“大胆假设”，就不会有独创性的见解，但若缺乏“小心求证”，也不可能得出科学性的结论。而陈寅恪先生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尤为研治古代文史者的圭臬。如果说《韩偓事迹考略》一书，还有一点创获，还能对喜欢阅读韩偓诗歌的人有所裨益的话，那完全是受到前辈学者启迪的结果。后生小子，何足道哉！

本书得以问世，我要衷心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责任编辑袁啸波先生的悉心修改与润色。袁先生补苴罅漏，耗费了不少心思，令拙作增色良多。周退密先生于今岁溽暑之际，以耄耋高龄，慨然为本书题签，使我铭感终身。

同时，我也要对所有关心、支持该书出版的朋友、同好，深致

谢忱。没有他们的共同帮助,该书的面世是无法想象的。

著 者

2003年10月写于沪上

-
- ① 韩偓晚年在《安贫》诗里有“报国危曾捋虎须”之句,言己在昭宗朝曾触怒过朱全忠。
- ② 嵇绍,晋人,“竹林七贤”之一嵇康之子。晋惠帝蒙尘,嵇绍以身捍卫,为飞矢所中,惨死于帝侧,“血溅御衣”(事见晋书《忠义传·嵇绍传》)。韩偓在《感事三十四韵》里有“溅血惭嵇绍”的诗句,自叹不如。
- ③ 陶渊明似乎对取代东晋的刘宋政权也采取了不予合作的消极态度,例如,他一方面不承认刘宋的年号,坚持以甲子纪年,而另一方面,则隐遁田园,与世无争(说见吴汝纶评注《韩翰林集》)。吴汝纶在韩偓《乙丑岁九月,在萧滩镇驻泊两月,忽得商马(一本无此二字)杨迺员外书,贺余复除戎曹、依旧承旨还,贼后因书四十字》诗后评曰:“乙丑,天祐二年,昭宣帝立已二年,年号不改。韩公不称年号,但纪甲子,此陶公旧例也。”吴汝纶将韩偓与陶渊明当作异世遗民相提并论的看法,实渊源有自,南宋刘克庄已开肇端,其《后村诗话新集》有云:“及朱三(全忠)篡弑,偓羁旅于闽,时王氏割据,诗文只称唐朝官职,与渊明称晋甲子异世同符。余读其集而壮其志。”然吴、刘“此陶公旧例”、“渊明称晋甲子”云云,唐房玄龄等奉敕编纂之《晋书·隐逸传·陶潜传》并未见著录。惟南朝梁沈约所撰《陶潜传》却谓:“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见《宋书·隐逸传·陶潜传》)。而《二十四史》的纂辑者对沈约此说颇不以为然,其在《宋史·隐逸传·陶潜传》后辨正道:“考陶诗俱不题年号,惟《祭程氏妹》文称义熙三年。宋高祖受禅,改元永初,是为庚申岁。集中诗凡书甲子者八年:庚子、辛丑、癸卯、乙巳、戊申、己酉、庚戌、丙辰,皆在永初之前,庚子、辛丑、癸卯又在义熙之前。永初以后,除《自祭文》题丁卯而外,无有书甲子者。约之纪事失实,大概如此。”(据清武英殿本《二十四史》)考证言之有据,似不可一笔抹杀。兹聊备一格,以质诸高明。

目 录

前 言	1
-----------	---

上 篇

一、韩偓生年考	1
二、韩偓字号考	4
三、韩偓出生地考	5
四、韩偓家世考	7

中 篇

一、概述	24
二、科举应试时期事迹考	28
三、仕途事迹考	51

下 篇

一、贬谪赴任行程考	116
二、弃官南下行程考	126
三、旅居福建行迹考	158

附 录

韩偓传记资料两种	199
《新唐书·韩偓传》	199
《十国春秋·韩偓传》	202
韩偓生平简表	203

上 篇

一、韩偓生年考

晚唐诗人韩偓，以唐武宗会昌二年(842)，生于京兆万年县(今陕西西安市)。

关于韩偓之生年，史无记载，故无直接证明的材料。现存唯一有力的旁证，来自其姨夫李商隐的一首诗：《韩冬郎即席为诗相送，一座尽惊，他日余方追吟“连宵侍坐徘徊久”之句，有老成之风，因成二绝寄酬，兼呈畏之员外》。两首绝句如下：

十岁裁诗走马成，冷灰残烛动离情。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其一)

剑栈风樯各苦辛，别时风雪到时春。
为凭何逊休联句，瘦尽东阳姓沈人。(其二)

现就诗中与韩偓生年有关联的内容，略作解释。诗题中所称的“韩冬郎”即韩偓。“冬郎”乃韩偓的小字。诗题中提到的另一个人：“畏之员外”，实即韩偓之父韩瞻。该诗首句“十岁裁诗走马成”，是夸奖韩偓年少而诗才敏捷，同时亦点明了他的岁数——这是确定韩偓生年的关键。既然韩偓“裁诗”相送的那年

恰是十岁，那么只要弄清楚该年的年份，就能准确无误地推算出韩偓的生年。

清冯浩《玉谿生年谱》定李商隐于大中六年(852)赴梓州(今四川三台县)，此诗乃大中七年(853)在梓州所作。近人缪荃孙《韩翰林诗谱略》与震钧《韩承旨年谱》均依据冯浩《玉谿生年谱》，认定韩偓大中七年十岁，由此上溯，遽定偓生于会昌四年(844)。这似乎已成定论，但近人张采田《玉谿生年谱会笺》拔新领异，考定柳仲郢大中五年(851)为梓州刺史、东川节度使，征辟李商隐为节度掌书记。张采田认为：“义山赴东川，而畏之亦出刺果州(近今四川南充市)。”并进一步认定：“义山赴蜀，在是年(即大中五年)之冬，其罢职入京，在大中十年之春，时畏之必亦由果州还朝矣。此诗盖东川归后，追记是年冬郎十岁裁诗相送事。”应该说，张采田考定李商隐乃大中五年秋冬之际赴东川幕府，有史为证，且与李诗所写“别时风雪”之情景，正相吻合，是可信的。故今人陈伯海先生、傅璇琮先生多采此说。而王达津先生将韩偓赋诗送别李商隐的时间提前一年(大中四年)，于史无据，非是(见其《〈宫柳〉诗和韩偓的生卒年》)。至于冯、缪、震诸人，不仅把李商隐赴蜀的时间弄错了，而且误以韩偓“裁诗”相送之年即李商隐作诗寄酬之年，遂认为韩偓大中七年(853)十岁。这实在是一个因轻忽而犯的错误，不足为训。

其实，李商隐应柳仲郢之邀，出掌东川书记，在其文中亦有反映。如《樊南文集》卷四有《献河东公启二首》，其一有云：“伏奉手笔，猥赐奏署。……有志为文，无资就学。虽杂赋八首，或庶于马迁；而读书五车，远惭于惠子。……伏惟尚书春日同和，秋霜共冽。……今者初涉将坛，始敷宾席，射江奥壤，潼水名都，俗擅繁华，地多材隗。……若某者又安可炫露短材，叨尘记室？

盐车款段，徒逢伯乐而鸣；土鼓迂疏，恐致文侯之卧。承命知忝，抚怀自惊。”按：河东公即为柳仲郢。文章写得很谦逊，说自己天资鲁钝，虽然作过辞赋，或许能望尘于司马相如与司马迁；尽管亦学富五车，可远没有惠子的辩才无碍。接下来说自己不该“扬才露己”，但这恰恰不正是想“扬才露己”吗？有时反话是要正听的，过分抑之正欲借以扬之。此外，应命时受宠若惊的心情亦跃然纸上。

这里顺便提一下，陈伯海先生沿袭张说，认为李诗乃“大中十年春返回长安重逢冬郎追忆之作”，似乎根据不足。张、陈唯一的理由是：大中十年，李商隐随柳仲郢自东川还朝。但问题在于：何以见得李诗必作于大中十年（856）东川还朝之时呢？大中五年（851）相别，要等到大中十年（856）才来作诗寄酬，无乃太晚乎！李诗尽管有“他日追吟”的词句，但揆之情理，其写作年代必离送别情事相隔不远，冯浩将其定在来年（尽管冯浩定李商隐离京迟了一年），而不是未来若干年后，想必就是基于这一点而考虑的。细玩诗意，定李诗作于大中六年（即送别之来年）春比较妥当。诗中有“剑栈风樯各苦辛，别时风雪到时春”之句，其意甚为明了，即：去年风雪交加时两人分别于长安，各各取道剑栈蜀水，备尝艰辛，于今春俱至蜀中矣。这亦是李诗作于大中六年（852）春天到达梓州后不久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其时，李商隐在梓州，韩瞻在果州，李以追忆去年京师相别情景，作诗赠送韩瞻，实乃合乎情理之事。当然，李诗究竟作于何年，无关韩偓生年宏旨。只要李商隐大中五年（851）随柳赴梓、冬郎“裁诗”相送时年仅十岁这一点确然无疑，则韩偓之生年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了。

要之，“冬郎实生于会昌二年壬戌，即八四二年”（陈寅恪批吴汝纶《韩翰林集》评注本卷首语）。

二、韩偓字号考

韩偓，字致尧，一云字致光，小字冬郎，自号玉山樵人。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五十一《韩内翰别集》提要谓：“《唐书》本传谓偓字致光，计有功《唐诗纪事》作字致尧，胡仔《渔隐丛话》谓字致元，毛晋作是集跋，以为未知孰是。案刘向《列仙传》称：偓佺，尧时仙人，尧从而问道。则偓字致尧，于义为合。致光、致元，皆以字形相近误也。”偓佺事见刘向《列仙传》卷上：“偓佺者，槐山采药父也。好食松实，形体生毛，长数寸，两目更方，能飞行逐走马。以松子遗尧，尧不暇服也。松者，简松也，时人受服者，皆至二三百岁焉。”古人取“字”，一般是对“名”的涵义的进一步诠释，如“孔明”这个“字”，用现在通俗的话说，就是很明亮的意思，这是对诸葛亮姓名里“亮”那个“名”的意思的进一步解释，是之谓“表字”。名与字，意义是相关联的。因此，韩偓字致尧是正确的。“偓”指偓佺，尧时仙人，尧从而问道，故说“致尧”。另外，岑仲勉先生在《补唐代翰林学士两记》上《补僖昭哀三朝翰林学士记》里说：“余按偓兄字羽光，致光或涉此而误。”分析何以产生“致光”讹误的原因，不无道理，正可作为韩偓字致尧的一个旁证。而《唐诗纪事》卷六五《韩偓》条则径直指出：“偓，字致尧，今曰致光，误矣。”韩偓小字冬郎，这或许可以约略推测其生于会昌二年（842）冬天。“郎”是对男子的尊称。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八《唐摹杂帖·李邕光八郎帖跋》：“明皇之子琬封于光，太宗之曾孙峤袭于濮。唐世重郎称，在至尊犹或名之，故虽帝子之贵，弗为渎也。”不仅“帝子”可以称“郎”，连皇帝老子亦能叫“郎”，如唐玄宗，时人称其为“三郎”。

韩偓自号玉山樵人，案“玉山”乃仙人西王母所居之地，据

《山海经·西次三经》：“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晋郭璞注：“此山多玉石，因以名云。《穆天子传》谓之群玉之山。”这里自然涉及一个问题：韩偓为何自号玉山樵人？韩偓此号始见于《香奁集》自序。《香奁集》之编定在天祐三年（906），韩偓时年六十五岁。其自序云：“或天涯逢旧识，或避地遇故人，醉咏之暇，时及拙唱。自尔鸠集，复得百篇。不忍弃捐，随即编录。”该年九月，苏曄以韩偓沦落诗稿见授，韩偓在《无题》诗序里说：“丙寅年九月，在福建寓止，有前东都度支院苏曄端公，挈余沦落诗稿见授。中得《无题》一首，因追味旧作，缺忘甚多，唯第二、第四首仿佛可记，其第三首才得数句而已。今亦依次编之，以俟他时偶获全本。”将《无题》诗编入《香奁集》，且云：“今亦依次编之”，则《香奁集》之编定应该在此之前不久。其时，韩偓在经历了险恶的政治斗争之后，对名利已然看淡，向往神仙似的隐逸生活，而西王母所居的玉山正好成为他心仪之地的一个象征，至于“樵人”在诗人心目中更是隐士的代名词。故取“玉山樵人”这个号，是韩偓俨然以隐士自命，反映了他晚年遁世的思想倾向。

三、韩偓出生地考

韩偓出生地为京兆万年县（今陕西西安市），对此，历史上的各种记载皆无疑义，我们可予首肯，惟周祖谟、叶之桦的《韩偓年谱补正》标新立异，认为“万年是韩偓的籍贯”，“他的住家似在户县而不是万年。”二位先生在下新的结论时，用了一个“似”字，可见还有一点不那么自信。他们的依据呢？从文中看，有二条，兹逐条加以辨析。

第一条，韩偓有《归紫阁下》诗，周、叶引用宋张礼《游城南

记》，谓“紫阁之阴即渼陂”，而《雍大记》云：“渼陂在户县西五里。”这大概就是韩偓出生户县的所谓根据，其逻辑推论为：紫阁峰的北面是渼陂，而渼陂又在户县西五里，故韩偓归紫阁即是归户县故里。我们且不来论历史文献的记载是否正确，就算历史文献记载正确，对于周、叶二位的推论，鄙人也不敢苟同。何以见得韩偓的归紫阁峰就是归故里呢？难道就因为紫阁峰在户县附近，而下得如此轻率的结论？细玩韩偓《归紫阁下》的诗意，倒不妨将紫阁峰视作诗人经常光顾的一个发愤攻书的所在，更加妥当，犹如李白在成都附近的读书处——大匡山。唐杜甫曾作《不见》诗赠送李白，期待他：“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见《全唐诗》卷二百二十七）韩偓在《归紫阁下》诗里劈头就谓“一笈携归紫阁峰”，可见这诗是韩公功名未遂后所写的，从该诗我们还可以确切地知道，这个紫阁峰，诗人前此曾经来过，故有“钓矶自别经秋雨，长得莓苔更几重”之句。这也就为我们解释了诗题何以要用“归”字。“归”的意思是离开后重又回来。

第二条与第一条有关联，周、叶二位抓住韩偓《归紫阁下》“钓矶自别经秋雨，长得莓苔更几重”这二句诗，又结合韩偓另一首《江汉行次》诗里“竹园相接春波暖，痛忆家乡旧钓矶”句子，断然在紫阁峰的钓矶与家乡的钓矶之间划了等号，这样的推论同样不能令人心服，因为此钓矶并非彼钓矶，换言之，紫阁峰有钓矶，家乡也有钓矶，不能一看到钓矶就认定只有一个，这样理解诗句太过拘泥而不免于张冠李戴了。总之，否定历史上有关韩偓出生地的记载，要慎之又慎，切不可抓住韩诗里的片言只语，随意加以联系，就妄下结论。

关于韩偓出生地的问题，似能从李商隐写给韩偓父亲韩瞻的几首诗里窥见一鳞半爪。大家知道，李商隐与韩瞻既是同年，又俱为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乘龙快婿。开成三年（838），李商隐

有《寄恼韩同年二首，时韩住萧洞》诗。张采田《年谱会笺》认为：“此萧洞当指泾原（唐方镇名，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北——引者注）。义山与韩同时议婚，而韩先娶，故艳妒之情，见于言表。时尚未构新居也。”最后一句不确，说详后。可见韩瞻当时还在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府里，而韩偓亦未出生。韩偓是韩瞻与其妻后来再度回到长安，于会昌二年（842）在王茂元为他们构建的新居里呱呱坠地的。韩偓的出生地与他的籍里应该是一致的。这可从李商隐《韩同年瞻新居饯韩西迎家室戏赠》诗里略知一二。诗中有“新缘贵婿起朱楼”之句，就是指王茂元为“贵婿”韩瞻在京师构筑新居事。诗作于开成二年（837），其时，韩瞻已应邀入王氏泾原幕府，并已娶王茂元之女为妻。该年初，韩瞻与李商隐同中进士，冯浩以为“韩得第即为茂元幕官”。以余意推断，韩瞻在京师中进士后，王茂元即一方面邀他入幕，一方面允其与女儿的婚配，而且想得很周到，凭藉自己固有的权势，在京师为他们建构了新婚之居。故韩瞻虽为“茂元幕官”，其实并未离京赴泾原，直至婚姻大事筹措停当，尔后，才自京师赴泾原迎新，但他们夫妇在京师新居完婚后不久，于第二年（开成三年）即返回泾原，在王茂元幕府任上生了韩偓之兄韩仪，这与前引李诗“韩住萧洞”之说相符。李商隐开成二年（837）尚在京师，第二年（开成三年）赴泾原幕府，与韩瞻始成为同事，在此之前只能算是“同年”。张采田说开成三年（838）新居未构，是失之于武断了。韩瞻新居之落成，不会迟于开成二年（837）秋冬。而韩偓之出生，当在韩瞻与王氏女结婚后五年，其时，他们已经离开泾原而身居京师了。

四、韩偓家世考

韩偓之父韩瞻，字畏之。李商隐《祭张书记文》著其郡望为

“昌黎”，这并不表明他出生于昌黎（今辽宁义县）。唐时昌黎韩姓乃大姓，故其他姓韩者往往称自己的郡望为昌黎。这也是一时社会风气使然。如中唐著名文学家韩愈虽著籍河南河阳，却每以昌黎自称，即其显例。李商隐著韩瞻郡望为昌黎，显然含有尊美的意味。

韩瞻开成二年（837）进士，同年考取的有晚唐最负盛名的大诗人李商隐。据李商隐后来写诗说，当年考试的成绩李优于韩，所谓“一名我漫居先甲”是也。“先甲”指进士甲第。《新唐书·选举志》谓：“凡进士试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经、策全通为甲第；策通四，帖过四以上为乙第。”

韩瞻与李商隐既是同年，又是同事，更是连襟。王茂元共有七女，韩瞻、李商隐所娶之妻为他最小的两个女儿。韩瞻成婚于前，李商隐接踵于后。据李诗“佳兆联翩遇凤凰”，则两人结婚的时间不会相隔太长。正因为韩、李有上述不同寻常的关系，故交谊自然十分深厚。现观览李商隐诗集，李写给韩的诗，就达七首之多（还不包括亡佚的），时间跨度从开成二年（837）至大中十年（856），前后差不多有二十年之久。兹拈七诗，逐首加以检讨，由此大致可以了解韩瞻生平的一些情况。第一首《韩同年瞻新居伐韩西迎家室戏赠》：

籍籍征西万户侯，新缘贵婿起朱楼。

一名我漫居先甲，千骑君翻在上头。

云路招邀回彩凤，天河迢递笑牵牛。

南朝禁脔无人近，瘦尽琼枝咏《四愁》。

诗作于开成二年（837）。这一年，韩、李同中进士，在仕途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所不同的是：韩瞻已成为有“籍籍之名”